

V 史话
I S I O N国家元气 全在风俗
汉代民风扶正祛邪启示

说起风俗，是古代人想到的不过是过年过节的小吃、庙会上的杂耍之类，其实不然。风俗是某一地区的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沉淀、累积而成的风气和习俗的总称。风俗扎根于社会底层，基础深厚，惯性强大，往往可以左右社会的走向。风俗的核心是当地文教正邪与盛衰，若是各地卖淫嫖娼成行，行贿受贿成风，聚赌殴打成癖，则社会发生动乱已经为时不远。因而风俗问题历来受到重视，不少皇帝微服私访，就是考察风俗是敦厚还是浇薄，以此判定地方官员施政的得失。中国幅员广袤，各地风俗殊万不同，如何整齐风俗，引领社会走向“道一风同”的境界，是历代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宋儒楼钥《论风俗纪闻》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清儒黄中坚《蓄斋集·风俗》说：“天下之事，有视之若无关轻重，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其中的道理，非常深刻。

观风俗，知得失。派遣风俗使巡访四方，成为汉代政治的一大创举

武王克商之后，周公制礼作乐，而有成康之治，刑法搁置四十余年不用，春秋乱世，王权衰落，夷狄入侵，风俗开始败坏。《汉书·地理志》纵论各地风俗，具体而深刻，如位于漳河与黄河间之大都会邯郸，北与燕、涿相接，南与郑、卫紧邻，各地风俗交汇于此，其民大多不把作奸犯科当回事。今晋北地区的钟、代、石、北诸州，靠近胡地，民众耳闻目濡，浸淫成风，好为奸诈，不事农商。今河北地区的赵、中山一带，地薄人众，因当年纣王长期在沙丘淫乱，遗民犹在，男人至今喜欢相聚游戏，以掘家盗墓为业，女子则以游媚富贵为荣。凡此种种，都显示了风俗的下滑与民风的侈靡，但由于战乱频仍，无人顾及这种情况。

汉代大一统帝国，疆域已与今日中国相当，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力迅速强大，风俗败坏的现象开始凸显，朝野上下意识到，整齐风俗，事关四方的文化认同与万民的素质，不可等闲视之，必须下大力解决。西汉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冬十一月，汉武帝下诏，提出通过“广教化”的方式，宣扬“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最终达到“美风俗”境界的治国理念，得到广泛响应。就两《汉书》所见，政治精英、社会贤达每有所论，必定品评风俗厚薄。如贾谊将社会上杀戮父兄、盗取宗庙祭器等现象归咎于“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龚胜多次上书，表达对“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的忧虑。魏相上谏书说，某年之中，郡国内子弟杀父兄、妻杀夫的恶性犯罪，竟然多达二百二十二人，原因之一是“风俗尤薄”。仲长统无限感慨地说，汉兴三百五十多年了，而时局依然是“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他主张“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诸位贤达忧虑风俗败坏之心，灼然可见。

许多官员上书，提出解决之道，比较一致

的意见是，模仿上古采诗故事，“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根据《礼记·王制》的记载，上古王者要定期巡行天下，考察风俗，倾听民声，但凡发现有内容纯正的诗歌，则加以采录，带回去推广，以此齐一民心。汉代官员认为这是值得仿效的制度，因而纷纷建议设风俗使，巡行天下。如魏相上奏宣帝，要求派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得到宣帝采纳，元康四年（公元前 62 年）春正月，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其后，派遣风俗使巡访四方，可谓史不绝书，成为汉代政治的一大创举。初元元年（前 48 年）夏四月，元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览风俗之化。”元帝建昭四年（前 35 年）夏四月，又派遣二十一人循行天下，“观教化之流”。平帝元始四年（公元 4 年）二月，遣太仆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受命担任风俗使的，都是学识广博、品德端正的儒者，如谷永“博学经书”“有茂才”；再如韦彪“好学治闻，雅称儒宗”“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汉章帝曾多次召见韦彪，“问以三辅旧事，礼仪风俗”。又如汉安元元（142 年）八月，顺帝派遣侍中周举、杜乔等八人为使，到各州郡巡行风俗，“班宣风化”，这八位使者“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天下号称“八俊”。

西汉政府为扭转暴秦以来的败俗，可谓不遗余力。汉武帝独尊儒术，大力进行社会改革，成绩卓著，社会风俗为之丕变。光武帝登基之后，尊崇节义，举用经明行修之儒，继续改革风俗，士大夫多有气象。东汉末年，宦官外戚篡政，党锢之祸叠起，“然而依仁蹈义，舍命不渝”的特立独行者，在在多有，顺炎武感叹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礼乐教化是移风易俗主要方式

治民之道，自古有法治与礼治之争。法治可立竿见影，礼治则见效缓慢，当以何者为优？汉人最初选择法治，法治一度成为主流，地方官员也多有以威猛之政统治民众的，如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骞协等，“以刻薄之姿，临人宰邑，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严酷法治仅能收一时之效，而不可长治久安。正如司马迁所说：“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主张以礼乐而非法制，作为经邦理民，移易风俗的达道。赞同孔子之说的官员也随处可见，他们身体力行，成效逐渐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朝野的共识。

礼乐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周易》贲卦的彖传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是以诗书礼乐教育民众，化成天下。《礼记·乐记》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是教化万民的灵魂，政是推行礼乐的工具，

刑是确保礼乐教化施行的手段。

两汉士大夫尊奉礼乐教化的信念，亲力亲为，移风易俗，最终达到大治的境界的成功范例，两《汉书》中屡见不鲜。

颍川是出名的难治之地，朝廷常常选择优良的官员去做二千石的太守。最初，赵广汉做太守时，痛感“其俗多朋党”，便鼓励民众相互告发。一时之间，局面似乎得以安定。但是，民众彼此结怨，埋下更大的隐患。韩延寿任颍川太守后，决定“教以礼让”，他从郡中长老中选择口碑很好的几十位，设下酒宴，诚意款待，以礼相接，询问当地谣俗与民间疾苦，亲自为他们讲解消除怨恨、彼此和睦亲爱的方法，得到了长老们的认同。韩延寿按照古礼的基本精神，与长老商定婚丧嫁娶的礼仪规范，接着，又命令学校中的学生手持俎豆等礼器，“为吏民行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数年之后，颍川大治。《汉书》说：韩延寿为官，“上礼义，好古教化”，所到之处，必定聘用贤士，以礼相待，表彰孝悌有行，修治学校。每年春秋，举行乡射礼，陈设钟鼓管弦，演示揖让升降之礼。民众耳闻目染，浸润日久，风气为之大变。有下属欺骗辜负他，韩延寿不是追究其人，而是痛自刻责：“是不是我做得不好，否则他为何会做这等事情！”他的属下听说后，无不惭愧，有人甚至觉得无地自容而自刎。韩延寿身为民众的道德表率，境内大治，“奸人莫敢入界”，堪称以礼乐治民的楷模。

士大夫的担当精神与表率作用

民风有正、邪之别，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不断扶正祛邪。风气的正与邪，与居于上位者的德性及执政理念直接有关。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吹在草上，草便随着风的方向，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地偃仆。君子的德性如何，决定民风的走向。《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原本是君上用来自教化下民的诗，所以《毛诗序》解释“风”字说：“上以风化下。”郭店楚简说：“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乱其民。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大意是说，同样的民众，在禹的管理之下是治民；到了夏桀的手下就成了乱民；到了商汤之下又成了治民。原因何在？在于为政者的有道与无道。

汉代风俗不变，除了汉武帝、光武帝的努力而外，士大夫敢为天下先，为民众表率，对于转移风俗，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两汉经学勃兴，士子以研读儒家经籍为终身职志，终身寝馈其中，经典精神必然内化于中，成为其文化理念，所以大多有经世致用、担当一代的情怀，一旦入仕，大多能以礼乐化民成俗为己任。

东汉名臣陈寔少年时便“有志好学，坐立诵读”，操行出众，“天下服其德”。其立身行事，正直无私，亮节高风，当时有人感叹说：“宁为刑罚所加，不如为陈君所短。”宁可接受刑罚的惩处，也不愿被陈氏所指责，其人格魅力于此可

见。某年岁荒，有盗贼乘夜色潜入陈寔家里，伏在屋梁上，陈寔发现后，佯作不知，把儿孙们叫过来训诫说：你若若不知努力，将来就会成为梁上君子！盗贼听后连忙下地，磕头求饶。陈寔见他相貌不像恶人，便规劝他“宜深克己反善”。后来听过盗贼陈述，知他家境贫寒，便送给他绢二匹。盗贼非常惭愧，发誓从此好好做人。此事传出后，万民震悚，“自是一县无复盗窃”。范晔赞美陈寔进退之节，必中法度，“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

繆彤少年丧父，兄弟四人原本同财共业。但各有妻室后，诸妇要求分财立户，屡有争斗之言。繆彤深怀愧疚，掩门自挝，说：“你修身行道，学圣人之法，准备整齐天下的风俗，为何连自己的家都不能正！”诸弟与妻听了，惭愧无比，都叩头谢罪，从此敦睦相处。

王丹，西汉末年曾在州郡任职。王莽时，隐居养志，家有千金，但“好施周急”。每年农时，就载着酒肴到田间，慰劳勤快的农民。懒惰者见状，都变得异常勤快。邑中之民相互激励，最后走上共同富裕之道。遇到轻黠游荡的无业者，王丹就晓谕其父兄，让他们加以指责。家有丧事的，都会等待王丹帮助操办，乡邻都习以为常。如此十余年后，“其化大洽，风俗以笃”。

两汉帝王，多能以推行风教自任。但是疆域辽阔，仅凭帝王一人之力，殊难扭转乾坤。汉儒对移风易俗多能自觉担当，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具体展现。顺炎武总结兴衰存亡，尤其注重对历代风俗的考察。他说，魏晋名士倡导“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重风流而无视国家安危，其结果是“国亡于上，教废于下”。顾炎武赞赏宋儒以名节相激励，尤其是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开启一代风气，士大夫由此“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所以，靖康之变时，“志士投袂起勤王，临难不屈，在所有之”，直到南宋灭亡之时，依然能“忠节相望”。

最近，东莞等地警方下大力扫除民众痛恨已久的黄赌毒窝点，此举与其说是解决治安问题，倒不如说是整肃社会风俗来得更深刻。治安是标，风俗才是本。时下，各地风俗问题不可谓少，风气下滑的趋势堪虞，此事关乎国家命脉，岂可听之任之！风俗美，社会才美；风俗坏，社会必败！这道理再简单不过。因此，今后对于官员的考察，应当将当地的风俗状况作为重要指标，风俗败坏之地的官员一律撤办。我们无法想象，一个风俗颓败的地方，也能称为文明之邦！班固《两都赋》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贾谊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归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重拳出击以治乱象之后，应该大力提升地方官员的道德水准，否则东莞的风俗永远无法彻底扭转。推之于其他省市，道理又何尝不是如此？

（摘自《人民论坛》）

V 域外
I S I O N

韩国：倡导员工准时下班

一直以来，“加班加点”是韩国上班族恪守的信条，而以“加班为荣”的职场文化也在韩国根深蒂固。2014 年 1 月 7 日，韩国政府主动出面，在国务会议上公布了“关于改善韩国人职场文化的工作计划”，并决定对此进行积极宣传，摒弃以“加班为荣”的观念，提高工作效率，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休息时间。

勤劳是美德，但过度勤奋也有负面影响。“过劳现象”在韩国非常普遍，并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韩国部分企业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积极鼓励员工准时下班。从 2013 年开始，位于韩国京畿道城南市益盆的一幢办公楼内，每天下午 5 时 55 分就播放鼓励准时下班的广播。内容为介绍可与家人共进晚餐的场所，或包括总经理在内的高层管理干部轮番拿着麦克风广播，催促员工们“早点回家和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等。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包括三星、LG 在内的大企业都开始动员职员准时下班。韩国企业这样做，其意图在于通过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协调，提高工作效率，希望员工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完成工作，而不是“磨洋工”。

韩国政府希望通过工作与家庭、休闲的均衡发展，最终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韩国政府将联合媒体、企业组成官民联合机制，对故意夜间加班、不必要的公司聚餐、不鼓励员工休假、男性育儿休假制度可有可无等作为社会热点加以讨论，以改变社会的整体思想和工作氛围。特别是要树立几个不加班也能干出好业绩的企业、会议最少化企业、鼓励休假和企业“弹性工作制”企业、下班时间自动关闭公司电脑的企业等先进典型。

韩国雇佣劳动部长房河男认为，要想改变韩国社会以“加班为荣”问题，仅靠政府的干预还不够。韩国社会要自觉抑制这种观念，创造社会成员能兼顾工作和家庭的良好氛围。

曹 勤

V 新 知
I S I O N古人的生活
比想象中更科学

古人刷牙吗？

古人也是很注重口腔卫生的。咱们的祖先老早就用右手中指当牙刷用了。再后来，印度人发明的“杨枝牙刷”由僧人传入中国，又名“木齿”。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将杨枝一头咬软，蘸了药物刷牙，便可以令牙齿光洁。更简单的方法是用“嚼”的，跟长须鹿似的嚼嫩树枝，也可达到类似效果。现代人哪天“野外生存”时，忘记带牙刷，不妨回归一下古法。

说到牙齿，那古人要是牙掉了怎么办？有假牙吗？这还真有。早在汉代，张仲景就发明了汞合金填充龋洞法。宋朝还出现了镶假牙的专业医生。古代的假牙材质很多，除了象牙、牛骨，还有坚硬的檀香。假牙除了能解决实际的用牙问题，还有装饰和卖弄的功用。“牙桥”，就是用软金铁线绑住牙齿，再绑入口内，没有咀嚼功能，纯装饰使用。

古人的闹钟只有公鸡吗？

古人们的闹钟应该都是靠公鸡，这是我们今人普遍的看法。那么，如果那只当闹钟的公鸡被宰了，怎么办？古人当然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除了漏壶和日晷外，古人还发明了香钟。就是以特制的模子制成盘香，盘香粗细均匀，燃烧时间才能准确。再从燃烧后剩余的盘香上的刻度来推测时间。后来，古人对香钟进行了改良，在香火烧到固定刻度时，上面挂的重物就会落下，撞击盘香下的金属器皿，达到闹钟的效果。

古人通常多久洗一次澡？

古代无论男女都留长发，而且是越长越好，这若是不注意个人卫生，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古人比我们想象中讲卫生多了。早在先秦时期，古人便“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到了汉代，还出现了“休沐”，就是说官员们上了 5 天班之后，能专门休一天假来洗澡。更有人因为喜欢洗澡而著书立说，这就是南朝的梁简文帝萧纲和他的《沐浴经》。古人洗头更勤，常常使用清水和天然清洁剂“无患子”来洗头。

古人没有冰箱，如何保存食物？

谁说古人没有冰箱？湖北省随县曾侯乙楚墓曾出土一件“铜冰鉴”，就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冰箱。早在春秋时期，奴隶们就冬天凿冰储藏，供贵族夏季饮用。简单地说，古代的“冰箱”是一个盒子，里头放冰块，再将食物放在冰中间，以达到防腐保鲜的作用。

古时就有地图吗？

传说大禹治水时，就有地图。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地图，是 3 幅距今 2000 多年的汉代古地图。西晋的地理学家裴秀创立的《制图六体》，使地图的编制有了更大的精确度。古代地图基本上是一步一个脚印量出来的，所以，制作地图的兄弟们，首先是跟唐僧似的苦行者。因为，想要制作一张全国地图，往往需要 10 多年，是个浩大而枯燥的工程。

铁杵真能磨成针？

在古代，凡属于金属类的东西都算贵重物品，如果典故属实，那位磨铁杵的阿婆，算得上有钱又有闲的人了。不过，制作铁针的确需要很大的恒心和耐心。先要将烧红的铁抽成铁丝，再剪成一段段，将一头磨尖，另一头钻洞，制作用于针灸的针就更烦琐了，要先插入腊肉中用油脂来填补坑洞，尖端还要磨得又尖又圆，才能避免戳断血管。

古代女人是如何化妆的？

涂脂抹粉是女人从古至今从未改变的爱好。古代女人最常用的三样法宝是：黛粉、妆粉和胭脂。“黛”是一种黑色矿物，把它先磨成粉再和水，可以用来画眉。妆粉就是现在的粉饼。胭脂是古代的口红，原料是一种叫“红蓝”的花朵，与妆粉调和后也可当胭脂使用。

古人写错字如何修改？

直接用毛笔涂掉是最简单的办法。王羲之和颜真卿两位大书法家，就是这样应付错别字的。而最普遍的方法是：在错别字旁边(通常是右上方)用毛笔加点，保留原字继续写下去。还有一种方法是，把名为“雌黄”的矿物涂在错别字上，有点类似现在的“涂改液”，信口雌黄就这么来的。

小 小

V 焦点
I s i o n

在职博士泛滥遭诟病，名校开始压缩招生

自 1983 年中国首批授予 18 个博士学位开始，30 年来，全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逐年扩张，6 年前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13 年的统计数据显 示，我国迄今共培养 50 多万名博士。

在已经授予的博士学位中，有多少是在职博士？没有确切的数字。但种种迹象表明，在职博士中官商博士占据很大比例。

在职读博有多难

较之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对攻读者的学术能力要求更高；从理论上讲，对在职博士和全日制博士的学术能力要求并无区别。和全日制博士教育相比，在职博士一般只有学位，没有学历。通常来说，官员若想获得一个博士学位，脱产不现实，只能选择在在职攻读。不过，也有不少学校招收可以同时颁发学历证和学位证在职博士，这种“双证”博士被认为含金量较大，攻读难度也更大，入学时需要参加学校统一命题的考试。

比如武汉大学 2008 年开始制定的“单独选拔优秀人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政策，招收的学生简称为“优博生”，对报考者的资格要求包括取得硕士学位 5 年或本科毕业取得学士学位 10 年、需在近 5 年内取得科研成果或管理成果等。从该招生计划曾经公布的通过资格审查的名单看，报名者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国企中层管理人员。

在通过入学考试之后，在职博士的课程安排通常集中在每个月的一个周末。一名在职博士报顾问说，“都需要上课，但是可以请假”。

跟全日制博士一样，在职博士最后毕业、获得文凭，需要发表文章、通过论文答辩。不过，一些学校的标准会“相对宽松”。

但是，在职博士毕不了业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任职的知名经济学者吴晓求，曾对媒体吐槽自己不愿招

在职博士，并提到该校读博 5 年以上还没有答辩的博士生中，95%以上都是在在职读博的官员。武汉大学北京研究院负责“优博生”计划的工作人员说，一些学员没有时间上课、写论文，往往需要延期，且这在各高校的在职博士中很普遍。

大部分学校都会要求在职博士生在 3~5 年内完成课程考试以及学术科研论文。但是通常都可以延期，有的甚至可延长到七八年。许多外地的高校为了方便学员上课，一般会 在诸如北京这种需求集中的城市设有 外 驻 机 构。比如上述武汉大学的“优博生”，以校外研究生班的方式进行组织，专业课在北京上，公共课才需回本校上。

“如果完全凭借自己的实力，是非常难的。”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对一般官员能够获得博士学位很是怀疑，“首先是考试选拔这一关很难通过，其次是专业论文创作和发表难，三是毕业论文难写作和通过。但对于一些有门路的官员来说，这都不是问题——考试时导师可以关照，录取时学校可以放宽条件特殊照顾，论文可以找别人代写，找关系发表，毕业论文可在导师特殊关照下过关。”因此，“个人认为，有相当多的官员，其真实能力和水平与其高学历、学位并不相称。”陆群说。

清理和拒招

在职博士的泛滥屡遭诟病，常常被归咎于博士生淘汰机制的欠缺。据了解，自 2006 年南开大学打破博士生“零淘汰率”、终结博士生无限延期后，陆续有高校对超过学习年限的博士生开展过清理工作。

2011 年底，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学籍进行了一次该校历史上力度最大的清理，发现该校 2006 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中，尚有 857 名未毕业。其中，253 人入学已有 10 年，甚至有 2 名 1990 年入校的学生截至当年尚未毕业。超期未毕业的学生

中，大多是在职博士生，且大多是有 一定职务的国家公职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者。

近些年来，不少名校已经在压缩在职博士生的招生比例，甚至停止招收在职博士。2003 年，北大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就宣布停招不能脱产的博士生。2004 年，南开大学首次提出，从 2005 年开始严格限制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所占的比例。2004 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对外宣布，将在第二年的博士生招生中，原则上不招收不能脱产学习的在职博士生。

不过，“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高校依然有各种“专项计划”。一些学校也用“单独选拔”来替代“在职博士”的说法，比如前文提到的武汉大学“优博生”计划。

学术自治

事实上，近年来屡有高校学者呼吁清理官员读博。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 2010 年曾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相关提案，希望维护高等教育的纯洁性及公平公正。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也曾撰文呼吁叫停官员读博。

“受教育本身是基本权利，即便是官员也无法剥夺他的受教育权。”教育学者、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官员博士泛滥，体现的是官员权力过大、缺乏监督。”

熊丙奇认为，在职博士的学术水平问题不是出在在职读博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学术机构的大学的招生、学位授予未能严格执行标准。压缩或不招在职博士生的做法，在熊丙奇看来，是高校在自身培养、淘汰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官员博士的核心问题在于：高校是否可以建立一套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制度？如果可以把住质量关，就没有必要在身份上做文章，但要达到这一目标，最终需要高校自身实现学术自治、去行政化。

陈舒扬